

玩出的成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文并摄

踩着高跷的孩子从身边跑过，操场上到处是骑着独轮车的孩子，这不是游乐场，而是一所小学。

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以下简称“新州二小”）不算大，空间几乎利用到极致。篮球场上围了26个篮球架，高矮不同，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都能玩；篮球场中间的空地上铺着带网格的塑料垫子，充作羽毛球场；篮球场外的水泥地上，刷了几块颜色鲜艳的格子，给学生玩“跳房子”。

一栋小教学楼的侧面装了两根爬竿，大教学楼的二楼吊下来两张软梯，还有两个滑梯。在校园的角落里，有自制的平衡木、轮胎攀爬架、攀岩墙……厨房外有片空地，搭了个舞台，供学生“K歌”。

只有上课期间，校园里会陷入短暂的安静，下课铃响起，电子女声催促道：“下课了，同学们请走出教室，呼吸新鲜空气。向远处望望，放松一下眼睛。”

全校两千多名学生，只有十多人戴眼镜，全校的超重学生也只有十多名。新州二小连续9年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中排名前列，最近两年位居第一。

校长杨昌盛在这里工作了13年，他说：“我只是想让学生们喜欢上学。”

一个爱玩的校长

一个足球重重地砸在杨昌盛的胳膊上，他没有中断和旁人的谈话，他习惯了。站在校园里，不时有孩子来找他：跑操时掉了5块钱该怎么办；两个打架的同学，您给评评理；什么时候去研学……

小学校园里常见的“禁止追逐打闹”“请保持安静”的标牌，这里一块都没有。杨昌盛笑了：“（禁止追逐打闹）这根本不符合小孩的天性。”

这名当了20多年校长的老教师总把“小孩的天性”挂在嘴边。

作为曾经的“差生”，杨昌盛能理解孩子们疯玩的愿望。他记得，儿时村子里有十来个孩子一起上学，最后反而是成绩差、最调皮的3个孩子坚持下来、考出去了，他是其中之一。

杨昌盛坚信，调皮也是孩子的天性，因为他自己小时候就格外淘气；馋邻种种的黄瓜，又怕偷吃会被大人责骂，他就把挂在藤上的黄瓜切下中间的一截，又拿小棍把两头接上，自以为伪装成原样。

成为校长后，杨昌盛更多关注的是孩子们喜欢什么。

看到学生拿粉笔在地上画格子、跳房子，杨昌盛让美术老师用油漆在操场地面上刷上彩色格子。

看到学生们爱唱歌，他找人在一块空地上搭建“阳光大舞台”，中午，学生可以来点歌。舞台旁还放了两摆凳子，供观众取用。

有段时间，用烟盒折的“烟卡”风靡，杨昌盛让学生改用废旧作业纸折卡，以年级为单位举办比赛。没过多久，这种卡就销声匿迹了。

“学生就是这样，你越不让他做什么，他就越好奇。你越让他做什么，他就越不做。”杨昌盛狡黠地笑了。

“阳光大舞台”旁边的电脑开始播放歌曲，杨昌盛看着大屏幕上的歌词若有所思：“现在小孩子不喜欢唱儿歌，都喜欢唱大人的歌。”

操场上有几拨学生在踢球，两三个学生在踢空矿泉水瓶玩，杨昌盛路过操场，说：“看来球不够了，还得再买几个。”

一所变得好玩的学校

每逢一年级入学，常有孩子在校门口哭着不肯进学校。

一到这时候，杨昌盛总在校门口“蹲守”，找哭哭啼啼的孩子们问原因。他记得，最多的一次，有21个孩子待在校门口不肯进来，“大部分都说学校不好玩”。

他说，那就想办法把学校变得好玩。新州二小的游乐设施越来越多：二楼护栏锯开口子，两侧各装了一个滑梯；二楼吊下两



每天11点多，贵州省黄平县新州二小都有一个班可以自己做饭吃。这天轮到一年级某班的小朋友，孩子们排队轮流切菜。



在贵州省黄平县新州二小，教学楼上挂了两张攀爬网。课间，孩子们在这里荡秋千、发呆。

张攀爬网，学生们荡秋千、爬网子；一楼的一整面墙做成了攀岩墙，下面铺上保护垫。学校经费有限，为了省钱，教师、家长自己动手：学生家长从乡下拉来木头，刷上彩色颜料，在校园的一个角落做了平衡木；木头和轮胎组合起来，又做了一个轮胎攀爬架；老师画图设计出吊环、三人制足球框的尺寸，如今还欠着工厂的吊环加工费。

说到这里，杨昌盛话锋一转：“前年开始，就没有学生不愿意进来了。”

学生没那么喜欢、但又必须做的事情，杨昌盛就想办法让学生喜欢：不喜欢学英语、背单词，就做个“英语周”，让孩子们比赛，“你追我赶的，就有兴趣了”；不喜欢跑步，那就做个“滑梯接力赛”；不喜欢干家务，就办生活技能大赛、烹饪大赛等劳动比赛……

杨昌盛记得，有个孩子偏胖，家长带他在学校操场上跑步减肥，一圈还没跑完，孩子就不耐烦了。

学校里装了滑梯后，杨昌盛看到，这个孩子滑下来，又从楼梯爬到二楼，滑下来、爬上去。杨昌盛离开前，看到他玩了15趟，还意犹未尽。

放学后及周末，学生可以带家长一起进来。记者看到，直到晚上8点多，还有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老师不得不再催促。

把学生逼出教室

2012年，杨昌盛刚来新州二小担任校长时，这里和普通小学一样，学生们下了课都要待在教室里，上厕所就得赶快回来。

为了把学生逼出教室，杨昌盛想了个“损招”：每个教室都装有扩音器，一下课就大声放音乐，逼得老师们讲不了课、学生做不了题，不得不走出教室。

他规定，老师们如果参与锻炼，生病了可以正常请病假，几乎不扣分；但如果不参与锻炼，以后生病请假，一律按照事假来算，扣分多。

连老教师，他也不放过，临近退休的老教师通常上道德与法治、科学之类的“副科”，杨昌盛鼓励他们去上体育课。他解释：“你们多锻炼，对身体好。”

杨昌盛自己也不再上英语课，改上体育课，一路成为全县、全州的示范课。新州二小的年轻教师甚至以为他是学体育出身。

这所小学举办了全镇的篮球赛、足球赛，又组织学校女足、女足，去参加全州的足球赛。即便在热爱歌舞、有“姑妈篮球赛”“乡村足球赛”等运动传统的黄平县，杨昌盛的做法在当时还是有些不被理解。

2016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举办全州足球赛，杨昌盛要带队参赛，可连每支球队的16名队员都凑不齐。有的家长把杨昌盛投诉到教育局：“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出去比赛？”

当时女足队长蒋莹莹记得，自己加入足球队后，每天早晚训练，成绩从全班十多名跌到四十多名；男足队员时泓迅原来稳居班级前三名，一路跌到中游……新州

师范毕业后，他曾到村小当教师，村小不做广播体操，他带着全校学生一起做操；后来调到一所中学当英语教师，他带着全校学生跑步。当时的同事评价他：“这个人有点冲（当地方言，意思是特立独行）！”

到新州二小，新任校长杨昌盛烧的第一把“火”是让教师、学生动起来：每天早上七点半跑早操。这个决定引来不少反对，老师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上好课，为什么要这么早来学校跑步？



每天上午的大课间，贵州省黄平县新州二小的每个年级都有各自的特色活动，五年级跳竹竿舞。

二小有支队伍一直打到决赛，得了全州第三名，足足花了两个星期才比完赛。

男足队员龙田的家长当时是另一所乡村学校的校长，和杨昌盛相熟，召开队员家长会时，杨昌盛特意把他请来当“托儿”，争取其他家长的支持。

杨昌盛坚信这条路是正确的。

几名队员告诉记者，他们成绩下降后，开始学着安排运动和学习时间。后来在初中、高中的尖子班里，小学足球队的队员们又相遇了。

2022年，新州二小入选崇信公益基金会“以体树人”教育联盟校。“联盟校”的校长和教师们到重庆、辽宁、云南等地的学校参观学习，这些学校都有鲜明的体育特色。该基金会的项目经理赵日记得，每到一所学校参观完毕，不出一个月，杨昌盛就会给他发来新州二小改造后的照片：校园里多了滑梯、攀岩墙、三人制足球框……

杨昌盛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参与运动的范围扩大。全校运动会上，跳大绳、接力赛，每个孩子都要上场；学校不仅有学生运动会，也有了家长、老师运动会。

全校的班主任接受培训，成为体育老师的“后备军”。学校除了春季篮球赛、秋季足球赛、冬季运动会，他正在考虑在夏季加人气排球比赛——普通排球太硬了，会打得孩子们手腕疼，改成气排球。

2024年全县足球赛的12个冠军（一到六年级都有男女队），新州二小得了9个。前段时间举办的全县篮球赛，12个冠军中，新州二小得了5个，一所规模小得多的乡镇小学得了两个冠军。

得少了，杨昌盛反而高兴。“要是一直都是我们二小包揽，就没人跟我們玩了。”



4月中旬，有个三四百人的教育参访团要到新州二小参观，校长杨昌盛（左二）在开会讨论接待任务。



贵州省黄平县新州二小有48个社团，每周上一次社团课。在泥哨社团里，一个女生在学着用黄泥捏造型。



贵州省黄平县新州二小的围墙上安装了扶手，供孩子们自学独轮车。



贵州省黄平县新州二小的足球场上放了数百个轮胎，供孩子们自由玩耍。课间，两个女生把轮胎当作沙发，坐着聊天。

黄平县教育局副局长龙晓明觉得，这也说明，最近几年，全县的体育氛围都带动起来了。

体育对孩子的影响不只在运动场上。球队的经历给了孩子“健康的身心、强大的抗挫能力”，有替补队员上不了场，也很坦然：“我帮他们拿衣服也行啊。”

很多老师都发现，喜欢体育运动的孩子，很少出现心理问题。杨昌盛说：“一个优秀的体育老师相当于10个心理咨询师。”

在记者几天的采访中，杨昌盛很少主动谈到学校学习成绩。杨昌盛认为：“小学不需要追求成绩，考到80分就可以了。”相比于小学阶段的成绩，他认为孩子们的“后劲”更重要。

但恰恰因为教学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平均分比全县排名第二的学校高十几分，杨昌盛不必再背负“不务正业”的批评，新州二小成了全县乃至全州学习的榜样。

“新州二小玩出了成绩，玩出了身心健康。”教育局副局长龙晓明和校长们开会时常常鼓励各校要多开展体育运动，他说，“幸好杨校长树立了一个标杆，否则我们在会上不论怎么要求都是非常苍白的”。

学会生活

因为体育项目、游戏项目多，新州二小很难用“整洁”来形容。

足球场上堆着几百个轮胎，这是老师、家长和汽修店捐的。一开始只放了几个，不够学生玩，一直增加到现在的四五百个。

下课铃响了，校园里有滚轮胎的，骑独轮车的，打羽毛球的，投篮的，踢足球的。

上课铃一响，骑独轮车的孩子们手忙

脚乱地把车锁在文化长廊下，操场上还倒着几辆车，有的车座或车锁掉下来，老师正学着修车。轮胎散落在球场边，篮球场上有遗漏的篮球。

课间操看起来也是乱糟糟的。

这所小学的课间操原本是广播体操和民族舞，杨昌盛全改了。他上学时，每天都在做广播体操，“太枯燥无味了”。

他让学生选出喜欢的音乐，找人剪辑好，上午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声一响起，学生们从教室里涌出。

每个年级分了操场上的块空地，练完拳后，兔子舞的欢快音乐响起，队形分布变了：有的年级拍篮球；有的年级跳板凳舞；有的年级跑操，跑操的队伍中间还混着几个骑独轮车的孩子。

篮球场的4个角落里都放着竹竿，经过日晒雨淋已经褪色，竹竿撞击的清脆节奏响起——五年级的学生开始跳竹竿舞了。

大喇叭里响起哨子声，队形分布又变了，全部学生集合到篮球场，背诵完三字经，齐声宣誓“我运动，我快乐”后，又消失在操场上。

杨昌盛不止一次被批评过学校不够整洁，他听了只是笑笑。“不太听话”的杨昌盛总是愿意听学生的话。

杨昌盛很少待在校长办公室里，他喜欢在校园四处转转，喜欢和学生聊天。

和习惯于跟孩子说“不行”的大人相比，杨昌盛很少批评学生，即便在校长、老师面前，学生们看起来也很放松。

记者正在篮球场上采访一位老师，这时下课铃响了，一个瘦瘦的男孩走过来，礼貌地问：“老师，可以让一下吗？我们要打羽毛球了。”

杨昌盛自称很少读高深的教育理论：“看学生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对于“让学生喜欢学校”这个目标有了更具体的描述：“希望未来让学生集学习、休闲、生活于一体。”

他发现，有的孩子分不清水稻和野草，“问学生鸡蛋是从哪里来的，学生说是从冰箱来的”。

在学校里，杨昌盛想方设法地打破家长给孩子套的“保护罩”。

新州二小的烹饪大赛始于2013年，孩子们系着围裙、戴着高高的厨师帽，自己做水果拼盘。

生活技能大赛也始于这一年。2017届毕业生龙然然还记得自己读二年级时的参赛情景，她紧张地躺在课桌拼成的“床”上等待信号，同学一交接棒，她就手忙脚乱地“起床”、穿衣服、扣扣子。旁边还有一组在比赛系鞋带。

前几年，学校里新建了“阳光厨房”，学生自己炒菜自己吃。“我跟家长说，你把孩子交到我这里，6年毕业起码让他们会炒12个菜。”

11点刚过，新州二小的“阳光厨房”就热闹起来，这里每天有一个班的学生来做饭，每学期能轮到两次。

记者到的这天，轮到一年级某班，孩子们戴着彩色厨师帽、穿着围裙，在菜板前排队准备切土豆、小葱。

10多公里外，新州二小还有个“开心农场”，老师们把20亩的土地分给每个班级。去年，学生们种的花生、萝卜收获了，有的煮熟了在班里吃；有的拿到县城市场上义卖，卖的充当天班费。今年开心农场种的是油菜，4月上旬，地里开满了金黄的油菜花，吸引来围观的蜜蜂。

农场里还种着杨梅树、李子树、枇杷树，教师廖士萱记得，去年枇杷熟了，全班去摘枇杷，一起过“枇杷节”。

这种“生活氛围”，来自杨昌盛作为教育者的危机感。

有次学校放假前，杨昌盛看到有位老师买了一些干腌面，他很纳闷儿：“你爱吃这个吗？”老师坦言：“我不知道怎么做饭，就吃这个。”也有的老教师一到饭点儿就急着赶回家，给上学的孩子做饭。

“我听了这话，真的着急。”杨昌盛说，“我们教了这么多学生，然后发现归根到底还是父母，我们要教父母该怎么做。”

杨昌盛干了20多年教育，他说，假如可以重来，希望做更多家长的工作，让家长学会放手。他正在考虑开办“家长学校”，不光要教好学生，还要教好家长。

杨昌盛很少谈及“升学”“成绩”，他更常用的词是“喜欢”“感兴趣”“高兴”。“我跟家长讲，孩子交到我们这里，未来不一定‘成才’，但一定‘成人’，成为社会的好公民。”

什么东西都能运输，包括把犹太人送去集中营；旅行社办理送犹太人去集中营的手续，和送旅客去度假，用的是同一套办公程序；纳粹分子侵占了部分犹太人的财产，一部分用来支付列车费用，相当于犹太人自掏腰包走向了死亡。奥斯维辛距离华沙只不过约300公里，却没有一点大屠杀的消息外泄。

还有部分冷眼旁观的波兰人，眼看着自己的犹太邻居、发小、同学被带走，却只顾着在犹太人离开后，霸占房子、侵占财产。他们麻木地接受了身边人的命运。有特雷布林卡的村民坦言，没有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会更好。这群麻木的旁观者也是这场人为制造的苦难的“共谋”。

这场人类暴行结束于80年前的5月8日：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战后，那位华沙犹太局的副局长成了登山出版社的编辑，一名前纳粹分子在啤酒厂干了20多年，每天能卖出四五斤啤酒。有的人继续住着犹太人家里的房子，一些犹太人散落在世界各地，有人表示自己不愿再回波兰。一位幸存者表示，对自己的幸存都很愧疚，“我何德何能可以逃脱厄运，这是我的同胞们无法逃脱的命运，是整个民族的宿命”。

“你要杀到了我的心，你会被毒死。”集中营留下的创伤，三四十年过去了，依然留在犹太人的心里。但生活还在继续。影片的最后一幕，一位犹太人回忆重返波兰市区那天，电影院、咖啡店、商店一如往常地开业，街上人来人往，阳光普照大地。

那段二战的历史忘不了，不该忘

□ 魏 晖

这个乡村平静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13岁犹太小男孩坐在船上，沿着河流高唱纳粹教他的歌颂士兵的歌曲；士兵列队走过，美丽的姑娘打开窗子……尸体的臭味裹在风里，吹得特雷布林卡——波兰一个小村子弥漫着一股怪味。每天约1.2万至1.5万人在特雷布林卡死去，那些死去的人不再以尸体或人称呼，而被称为木偶、布娃娃、抹布，扔进焚尸炉里。

这是纪录片《浩劫》所描述的二战集中营的故事。它是202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片单中最长的电影，566分钟，近10个小时，全球超7000万人已经看过。4月27日，北京上百位观众在巨幅银幕前观看了二战时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历史。在中国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温老片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和平的重要性。

《浩劫》没有出现令人不适的镜头，没有出现一具尸体，也没有运用历史资料和档案，导演克罗德·朗兹曼只是把镜头对准了一位历史当事人，请他们回忆在集中营所看到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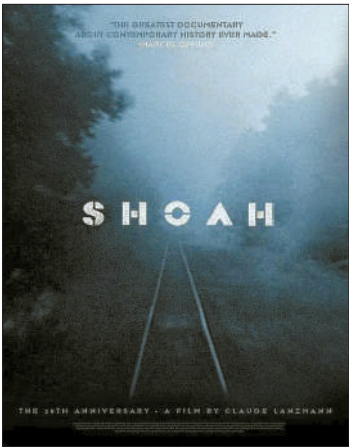
在亲历者的记忆中，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卡车将尾气通过管道排入封闭的车厢里，犹太人一开始在车厢内叫喊，后来声音越来越弱，最后，卡车停在森林深处的壕沟前，车厢里的人都死了，遇难者就像“土豆一样”硬邦邦地滚落出来；奥斯维辛集中营

的毒气室会有场生存决斗，因为毒气从下到上散发，越往上的空间，人越好呼吸，有力气的人会争抢踩着其他人往上爬，往门边挤。结束后，毒气室的门一开，人堆得像玄武岩一样一层层，体力最弱的人叠在最下面。

导演细致地追问着当时的场景：毒气卡车长什么样？什么颜色？车速如何？最后拼凑出一个精密高效的死亡流水线，将工业文明引以为傲的“效率”落实到每一步步骤——绿皮的德式卡车需要缓缓前行，一旦车速太快，抵达目的地时，车厢内会有幸存者；有一次，卡车侧翻了，犹太人从车厢里逃出来，被士兵用枪击毙。

那名13岁的犹太男孩说，从记事起，街上都堆满死人，有人太饿了，走着走着倒下了死，他以为这是稀松平常的事。他在镜头前的表情一直是木讷、呆滞的，似乎已经接受了过去。还有人微笑着聊起往事，导演问，你“怎么一直笑？”他回：“不然呢，我哭吗？既然还活着，就笑吧。”但当他想起自己妻女的尸体叠在壕沟里，一层一层，堆了四五层尸体，他终于绷不住哭了。

还有理发匠，在集中营为那些即将进入毒气室的女人剪头发——纳粹希望女人误以为是普通的剪发活动，能平静地走进毒气室。理发匠形容，那时他对一切的感



▲纪录片《浩劫》展现的集中营遗址。

受都消失了。但当他提起一位好友的妻女也走进毒气室，他停顿了数分钟，一直无法继续陈述那个场景，导演恳求他：“你必须说下去，我向你道歉，我知道这是残酷的事。”

他们的口述冗长、沉重，让我有种窒息、想呕吐的感觉。一张张痛苦扭曲的脸，中间夹杂着多国语言翻译，复调地陈述事实。这种口述的记录方式让我每一分钟都感觉很煎熬，又忍不住继续看下去。

我看过电影《美丽人生》，年轻的犹太父



▲纪录片《浩劫》展现的集中营遗址。

亲把集中营的苦难编成一场游戏哄骗儿子，用喜剧的细节讲述集中营的苦难，但它给我的感受，远没有《浩劫》来得真切。我想，这是真实的力量、陈述的重量。只有忠实地记录，不加虚构地聆听亲历者的经历，才是了解这段恐怖历史最不加修饰的方式。

纪录片里，一位犹太人拉着外来的人，给他指出犹太隔离区，重复说，“They are dying!”（“他们正在死去！”）“Remember! Remember!”（“记住这个！记住这个！”）

铭记，而不是遗忘，是所有亲历者共同的心愿。往事沉重又复杂，一位亲历者说，他愿意回忆，是因为他知道这部纪录片的意义。

这同时也是导演朗兹曼的心愿。他用11年，寻访14个国家创作，1985年公映的《浩劫》，选用亲历者回忆、口述、互相印证的证词拼接了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等集中营的过去。导演朗兹曼最初对《浩劫》的影响力有较低的预期，“有人看就不错了，大概3000人看过，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实际上，《浩劫》首映后，迅速引起全球轰动。

这位出生在巴黎犹太家庭的导演，二战时全家躲在后花园的地洞里，躲过了灾难，他的后半生都在创作与犹太人大屠杀相关的纪录片，拒绝虚构与修饰，那段年少的记忆和群体的苦难是他的创作母题。

朗兹曼的镜头还对准了前纳粹分子，放大他们躲闪、否认、扶额、尴尬等各种表情。纳粹德国在波兰首都华沙建立封闭隔离区，逐步将囚禁在此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屠杀，当时管理华沙犹太局的副局长事后推脱，自己当时只不过28岁，导演却戳破他的谎言，“30岁了，三十而立，您还是法学博士”。

还有许多“共犯”：帝国铁路只要给钱，